

# 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

拜根兴、侯振兵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众所周知,唐朝与地处东北的藩属国高句丽保持宗藩关系。然而,唐人如何看待桀骜不驯的高句丽?高句丽灭亡之后,众多的高句丽遗民入唐,在开放包容的国度里,唐人对高句丽遗民的到来感受如何?对此,学界似很少有人论及。无疑,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和入唐的其他民族一样,高句丽遗民最终融入唐人共同体之中,显示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极强的包容性和向心力。

**关键词:** 唐人 高句丽 高句丽遗民

初唐时代唐朝与周边民族关系中,地处东北地区的高句丽<sup>①</sup>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自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668年高句丽灭亡,唐与高句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和战交涉,对此,将其概括为“激荡的五十年”<sup>②</sup>,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668年高句丽灭亡之后,大量的高句丽遗民以各种方式来到唐朝,在唐朝各地繁衍生息,最终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研究唐人对高句丽族类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可以进一步清楚初唐时期在宗藩关系前提下,唐与高句丽矛盾产生的潜在原因,双方关系发展的脉络,以及高句丽遗民入唐后所面临的困难与适应在唐生活的艰辛,对这一时期唐与东北边疆民族关系研究的深入,无疑将会有大的推进。

## 一、对于高句丽

唐朝建立之前,中原王朝与高句丽往来频繁,正史史料中亦屡屡提及,相信唐人对高句丽的了解应该更多。唐人编撰的《隋书》中,对高句丽都城、官等、赋税、刑罚,以及隋朝与高句丽的交涉,隋朝因征伐高句丽导致灭亡<sup>③</sup>都有详细的记载。应该说,初唐时代人们(包括《隋书》编撰者魏徵等人)对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与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有关。就是说,征伐高句丽成为隋朝灭亡的导火线<sup>④</sup>,而由于征伐战的失败,大量的隋朝俘虏滞留高句丽,成为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君臣百姓难以言表的痛。唐朝建立之后,按照业已形成的“天下秩序”<sup>⑤</sup>,唐朝与高句丽宗藩关系建立。但是,由于唐朝此时全力对付其它割据势力,对东北边疆藩属地区尚无暇顾及,高祖李渊对高句丽臣服问题曾有过其他的想法,进而引发朝野争论。

《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句丽》条载:

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

① 唐代文献均把高句丽记作“高丽”,本文除引用史料原文不作更改外,行文中一律写作“高句丽”。

②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2~269页。

③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81《东夷·高丽》,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刘健明《隋炀帝对高句丽的三次战争》,《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约瑟《隋朝对高句丽的认识》,(台北)《韩国学报》总第13辑,1995年。

⑤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观念,参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第65~171页,(台北)乐学书局2003年版。下文中提及有关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方面论述,均见高氏上述著作。

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诏述朕此怀也。”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

《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条记载简略，基本上就是上述引文的缩写。《唐会要》卷95《高句丽》指出此次讨论发生于武德八年（625）三月十一日，并增加了两句话，即裴矩、温彦博的奏言中还有“若与高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sup>①</sup>。可以看出，唐祚虽建，但各种事务纷杂，对高句丽是否臣服问题，唐高祖援引亡隋教训，拟采取相对和缓的策略，但朝中大臣不仅提出辽东土地的归属问题，而且坚持固有的天下秩序观念，认为高句丽必须臣服中原王朝，遵从天下秩序规定的宗藩君臣名分，否则，“四夷必当轻汉”。唐高祖最终听从臣僚的建议，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由此可见，当时中原王朝是主体，处于东北边方的高句丽为藩邦，这种理念人们已根深蒂固。虽然此后唐朝与高句丽在一些问题上形成共识，双方在固有秩序基础上加强来往，但由于各种具体矛盾的日渐彰显，致使矛盾激化。例如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贼杀高句丽王和大臣，进攻新罗，又不听从唐朝劝阻，这就和唐朝倡导的天下秩序理念背道而驰。唐朝在规劝晓谕无效的情况下诉诸武力，“拯救高句丽百姓于水火”，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如在征伐高句丽之前，唐太宗亲自访问参与隋朝征伐高句丽健在的军将，了解时人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总结出征高句丽五大必胜理由，即“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待劳，以悦当怨”<sup>②</sup>，以此统一思想、鼓舞士气。

如上所述，在对待高句丽问题上，唐初君臣的看法往往出现差异，显示出君臣出发点的不同和对高句丽的不同认识。贞观十八年（644）前后，唐太宗与臣僚的谈话中常常涉及高句丽。一方面，唐朝君臣轻视高句丽，但对即刻出兵征伐，特别是唐太宗亲征却有不同看法。如宰相房玄龄上书云，“陛下每决死罪，必三覆五奏，进疏食，停音乐，以人命之重为感动也。今士无一罪，驱之行阵之间，委之锋镝之下，使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辎车，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变动阴阳，伤害和气，实天下之痛也。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能为后世患，夷之可也。今无是三者，而坐敝中国，为旧王雪耻，新罗报仇，非所存小、所损大呼？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即臣死骨不朽”<sup>③</sup>。就是说，房玄龄不同意出兵高句丽，希望唐太宗不要出兵征讨。大将尉迟敬德也认为，高句丽“夷貊小国，不足枉万乘，愿委之将臣，以时摧灭”<sup>④</sup>。另一方面，由于隋朝灭亡直接与征伐高句丽有关，数以万计的隋朝俘虏仍然身在他乡，此前唐朝使臣出使高句丽时已清楚地了解到这种情况；同时，唐朝要重新建立中国的“天下秩序”，而高句丽权臣当道、进攻新罗，特别是辽东的归属问题被重新提出，这些问题都触发唐朝人怨恨高句丽的神经，故而对高句丽谩骂、诅咒常见于载。

到征伐高句丽前夕，由于官方舆论鼓动和民间因过去的创伤持续发酵，唐人对高句丽的看法已

①（五代）王溥《唐会要》卷95《高句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贞观18年11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新唐书》卷89《尉迟敬德传》。

相当负面。当时出现自愿以私装从军，“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sup>①</sup>的集团认知心理，也显示出唐朝舆论宣传的威势及民间对高句丽的同仇敌忾。应该说，为前隋复仇的群体心理趋向，使此一时期唐人对高句丽的认识趋于极端，高句丽自身在与唐朝交往中有违藩属国本分的行径，也为唐人的认识趋向提供了口实。唐军进军建安城下，抓获高句丽莫离支派出的间谍高竹离，其人长途跋涉数日不食骨瘦如柴，唐太宗命赐食并放回，云：“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sup>②</sup>可以看出唐太宗为了鼓励士气，并不看重高句丽的应战，对战争最终胜利也是意气满满。贞观十九年征伐战争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唐太宗也发出“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感叹，足见唐太宗对高句丽的看法已相对实际和深入。安定乌氏（今甘肃泾川）人梁基参加过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战争，贞观二十二年（648）死于善山（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善山），他的墓志中赫然写道“近以东夷小丑，暂阙朝仪，圣上方命将徂征”<sup>③</sup>，而此一时期关联墓志中如此句读很多，足以体现七世纪中后期因双方兵戎相见，中原百姓对高句丽的认识极趋负面的现实。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sup>④</sup>四月十六日，唐朝任命兵部尚书任雅相为涇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分水陆两路进军高句丽，高宗曾打算亲率六军前往。蔚州刺史李君球以春秋大义谏阻，反对皇帝亲征。他认为国家要以仁义服众，不要轻易动用武力，否则，轻则“疲中国之人，倾府库之实”，重则“至于失国”。况且高句丽“僻侧小丑，潜藏山海之间。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设令高丽既灭，即不得不发兵镇守。少发则兵威不足，多发即人心不安”，认为征伐高句丽根本没有必要。<sup>⑤</sup>这封奏疏虽没有被高宗采纳，但奏疏的主要意思是劝阻高宗亲征，显示出朝廷在对高句丽用兵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当然，从引文中也可看出唐人对高句丽的蔑视。与此同时，潜入唐朝的高句丽人也发起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以期扰乱唐朝后方秩序，取得战场以外的收获。赵州石桥是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宏伟坚固，石刻精美。“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有石狮子。龙朔年中（661~663），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sup>⑥</sup>。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工艺史上的损失。在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下，这种由于宗藩内部矛盾引发的破坏事件，虽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大的不安或忧虑，但毕竟造成一定的损害，增加了唐人对高句丽人的愤恨情绪。只是唐人并没有因此而畏惧高句丽，而是采取一些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保证征伐后方的平安。

咸亨初年，为了应对朝鲜半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唐高宗派大将高侃、李谨行等人率军前往高句丽故地，平定当地高句丽人叛乱。“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请诛之。上谓处俊曰：‘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特令赦之”<sup>⑦</sup>。从整体看，上述史料体现作为宗主国，即使处于交战之特殊时期，唐高宗内心不仅处处显示出宗主国的高傲威严，而且在战略上轻视高句丽。同时，由于在实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唐朝君主，他们对高句丽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真实，对解决高句丽灭亡后的一系列问题提供

① 《资治通鉴》卷 197，贞观 19 年 3 月条。

② 《资治通鉴》卷 198，贞观 19 年 8 月条。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 153，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 《旧唐书》卷 185 上《李君球传》作龙朔三年。

⑤ 《唐会要》卷 95《高句丽》。

⑥ （唐）张鷟《朝野僉载》卷 5，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⑦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 84《郝处俊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了决策依据。

## 二、关于高句丽遗民

高句丽灭亡后，众多的高句丽人来到唐朝。在唐朝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高句丽人和入唐的其他民族百姓一样，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然而，对于唐人来说，胜利者的姿态流溢出的优越感当是难以避免的，而对于入唐的第一代高句丽遗民来说，灭国之恨也使其难以释怀。又因入唐陌生生活及各种意外情况的催化，导致一些人不惜代价、抓住尽可能的机会进行所谓的复仇。对此，其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却加深了唐人对高句丽遗民的负面评价。唐张鷟《朝野僉载》载云，高宗朝中书舍人郭正一参与唐朝征伐高句丽战役，唐罗联军攻破平壤城后，他获得一个非常“姝艳”的高句丽婢女玉素，并将她带回都城长安宅第，委以府宅财务之权，但此高句丽婢女在赢得郭正一信任后，却蓄意谋财害命。“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虽然谋杀主人未遂，玉素逃之夭夭。但郭正一录奏此事，皇帝敕令长安、万年两县的“不良人”<sup>①</sup>捉拿高句丽婢女，最终在金城坊一所空宅找到，才知道她与其他入唐的高句丽遗民有瓜葛，后来同斩于东市<sup>②</sup>。高句丽遗民谋杀唐人事件应该不止此一例，只是由于郭正一参加过征伐战争，并且任职中书省，位高权重、影响非凡，才被人特别留意罢了。

在日常生活中，高句丽灭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唐人把“高丽”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赋予其特殊的含义，以表达自己对人或事的看法。通常情况下，这种语言习惯都含有轻蔑调侃的意味，即高句丽遗民被拿来作调侃、揶揄之用，以显示说话者的诙谐幽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高句丽人爱喝酒，唐人就用“高丽”代称嗜酒无度者。如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目（原误作‘有’，据《太平广记》卷 255 改。）[紫薇]舍人郑勉为醉高丽”<sup>③</sup>。郑勉是唐玄宗朝人，时人苏頲评价他是“措心精核，尤明理体”<sup>④</sup>。宋璟云：“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硤二州刺史。”<sup>⑤</sup>可见郑勉是一个善变的人，又爱饮酒，在当时的政坛上并不具有权威的地位，才会被魏光乘调侃。

还有的人用高句丽风俗作为谄媚的工具。《大唐新语》卷 9《谀佞》载：

张易之兄同休，尝请公卿宴于司礼寺，因请御史大夫杨再思曰：“公面似高丽，请作高丽舞。”再思欣然，帖纸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丽舞，略无惭色。……天下名士，视再思为粪土也。<sup>⑥</sup>

① 关于“不良人”，参赵守俨《“捉不良”与“不良”》，收入《赵守俨文存》第 186~189 页，中华书局 1998 年版；朱雷《释“不良人”与“白水郎”——读〈唐大和上东征传〉质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6 辑，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朝野僉载》卷 5。

③ 《朝野僉载》卷 4。

④ （清）董浩《全唐文》卷 250《授郑勉紫薇舍人等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⑤ 《资治通鉴》卷 212，开元 6 年 11 月条。

⑥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 9，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杨再思为献媚张氏，被人说成“面似高丽”也不生气，反而变本加厉，跳起了高句丽舞蹈。高句丽人“衣裳服饰，唯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绀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韦履。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sup>①</sup>，颜色尚白，杨再思对这一民族风情很了解，所以他才打扮成“帖纸旗巾子，反披紫袍”的模样。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受到朝野的轻蔑，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随着大量高句丽遗民在唐生活，不仅当时唐朝宫廷乐舞中已经收有高丽乐、百济乐，高句丽人的衣帽特征、风俗习惯，已为众多的唐人了解，而且一些风俗习尚也渗透到唐人的语言和行动中。

当然，在唐高句丽遗民上层人士最能感受其中的意味。高句丽遗民泉献城入唐后任职右武卫大将军，受到武则天的嘉奖。武则天曾经出重金选拔都城禁卫军南北牙善射者，身为右武卫大将军的泉献城拔得首筹，但泉氏礼让同为蕃将的右玉铃卫大将军薛咄摩，薛咄摩不愿接受，又让与泉献城，两人相互推让。泉献城上奏武则天，认为“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结果，武则天“善而从之”<sup>②</sup>。此史料首先证明作为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对于蕃汉将领一视同仁对待，所以才有不分族类、级别选拔善射者事件的出现。其次，泉献城从蕃汉团结大局以及照顾汉族将领的颜面角度出发，建议武则天停止这种可能造成一定后果的选拔活动，显示出虽然唐朝奉行开放包容政策，各民族百姓在同一片蓝天下，逐渐形成同一民族共同心理，但其中的多样性或者差异性，以及以汉族主导的共同体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作为入唐的高句丽上层人士，泉献城已经朦胧地认识到这一点。再次，武则天接受泉献城的建议，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泉氏识见的认同，体现出女皇武则天从谏如流，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领导者作风。与此相联系，此一时期在唐高句丽遗民首领高足酉给儿子起名为“帝臣”，李他仁为唐朝出征镇压辽东高句丽遗民反叛，高性文、高慈父子参与平定契丹叛乱，为武周王朝边疆的安宁抛洒热血献出生命<sup>③</sup>，高玄接受武周政权的差遣，到各地了解高句丽兵士的实际状况，高句丽王室高藏的孙子高宝元受命前往辽东，招抚那里的高句丽遗民等<sup>④</sup>，说明投诚武周，和中原政权合作的高句丽上层人士，他们的行为已获得唐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并融入大唐上层社会之中，成为捍卫大唐边疆的中流砥柱。同时，随着高句丽在唐第二代、第三代人士融入唐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唐朝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下，高句丽遗民后裔所谓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sup>⑤</sup>，高句丽灭亡前后双方的隔阂及各种摩擦渐趋平复，唐人对高句丽遗民的认识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曾在唐玄宗即位过程中建立功勋的高句丽遗民后裔王毛仲，就是一个完全唐人化的高句丽遗民典型，他已经和唐朝官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权高跋扈，陷于唐朝廷政治争斗漩涡，最终死于非命<sup>⑥</sup>。

也有一种例外，这就是入唐各少数民族之间，他们相互接受并和睦相处，但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及本身地位的影响。唐玄宗开元末，边将多任用边疆少数民族将领，成为开元、天宝国家军事措置的重要特点之一。高仙芝为高句丽遗民后裔，其父高舍鸡起初在唐朝河西军服役，高仙芝后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手下任职<sup>⑦</sup>，受到节度使夫蒙灵詵的拔擢，开元末年担当安西副都护。因为夫蒙

① 《旧唐书》卷 199 上《东夷传·高句丽》。

② 《资治通鉴》卷 204，天授元年（690）条。

③ 拜根兴《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铭关联问题考释》，（韩）《忠北史学》总第 22 辑，2009。

④ 拜根兴《高句丽遗民遗迹、遗物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年第 1 期。

⑤ 马一虹《从唐墓志看入唐高句丽遗民归属意识的变化》，《北方文物》2006 年第 1 期。

⑥ 《旧唐书》卷 106《王毛仲传》。

⑦ 关于高仙芝的年龄，《旧唐书》、《新唐书》本传没有提供确切的信息。不妨根据现有史料试作推证。《旧唐书》卷 104《高仙芝传》载：“年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詵累拔擢之”。查阅《唐方镇年表》等书，知晓盖嘉运开元二十二（734）年担当北庭经略使，次年升任北庭都护，而担当北

灵警对高仙芝有知遇之恩，当高仙芝打败小勃律国班师，结果与顶头上司夫蒙灵警产生矛盾。史书载云：

天宝六载（747）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警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镇守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副都护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马使谁边得？”曰：“中丞。”灵警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又谓刘单曰：“闻尔能作捷书。”单恐惧请罪。令诚具奏其状曰：“仙芝立奇功，今将忧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警为四镇节度使，征灵警入朝。灵警大惧，仙芝每日见之，趋走如故，灵警益不自安。<sup>①</sup>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高仙芝的上级夫蒙灵警对于高仙芝越级告捷的行为非常气愤，认为高仙芝“忘恩负义”，因而调动一切可以解恨，极尽恶毒、侮辱的语言谩骂高仙芝。怎么解释夫蒙灵警的行为？笔者认为：其一，这是夫蒙灵警气愤至极的一种极端表现，作为一介武将和少数民族将领，他的行为没有必要作过多的诠释。其二，高仙芝的做法确实不妥，依据夫蒙灵警的说法，这样做是一种犯罪。高仙芝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立功后得意洋洋，因而不把夫蒙灵警放在眼里，这也正是夫蒙灵警气愤发火的重要原因。其三，因高仙芝被痛骂为“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就认为高仙芝在此之前就不被看重、地位地下，此也不符合事实。其四，当时少数民族将领之间互相打趣谩骂十分常见，在今天看来很重的诟骂语言，而在当时似并不代表歧视。如安禄山与哥舒翰互相谩骂就是一例<sup>②</sup>。这样，高仙芝被其上司责骂，反映了高仙芝与夫蒙灵警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是特殊事件引起两人的对立，并不代表此一时期唐人对高句丽遗民认识的改变。

另外，到开元以后，随着入唐高句丽遗民后裔与唐人融合步伐加快，唐人对统治区内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已和对其他入唐民族人士没有什么不同。如李白有诗《高句丽》云：“金花折风帽，白

---

庭经略使肯定还应在734年之前。如此，二十余岁的高仙芝历经任职田仁琬、盖嘉运麾下，此肯定还要经过几年时间。如果以三十岁整数作为高仙芝任职盖嘉运麾下的年龄，则高仙芝出生当为公元704年前后，天宝十四载（755）六月被杀于潼关，其年龄当在五十一岁上下。如果上述推定不错的话，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当为出生于唐境的高句丽第二代遗民。

①《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

②《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载：翰素与禄山、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其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噪，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sup>①</sup>，从诗中可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服饰装束，到此时还没有过多的改变，显示出李白对定居中原高句丽遗民的欣赏之情。唐中后期还出现有高句丽遗民后裔平卢、淄青节度使侯希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家族等，这些人已是高句丽遗民第四代或第五代后裔，对他们来说，出身高句丽民族只是一个符号而已<sup>②</sup>，唐人对他们的认识，和他们作为唐朝地方藩镇的身份是相吻合的。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对高句丽遗民的认识，从最初满怀华夷观念，复仇、幸灾乐祸心理，到高句丽遗民融入唐人大家庭之后，逐渐适应、接受，以至于没有区别地首肯欣赏。这一漫长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适应、接受，乃至最终融合历程的重现。这个复杂的过程有争执、有对抗、有不和谐、有无可奈何，但中华文化无可伦比的向心力、包容性，以及时间的推移，使得这种过程往往以圆满的结局而告终。同时，唐人不仅对高句丽整个民族有看法，对高句丽裔的“方外之人”，也有自己的思考。

### 三、关于高句丽僧人

毋庸讳言，入唐高句丽遗民中，也有一些佛教僧侣，他们的行为方式、个人品质在唐人的心目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人在日常谈话过程时，经常会举出一些与高句丽僧人关联的典故来，右御史台的雅号就是其中之一。《太平广记》卷 254 “左右御史台”条引《御史台记》记载云：“唐孝和朝，……，左台[御史]呼右台[御史]为高丽僧，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啜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sup>③</sup>就是说，唐中宗在位期间，左右御史台在京事务的繁重程度和政治地位均有差别，左御史台因掌管京师官员的弹劾，府衙设于京师长安；右御史台掌管外官的纠察，府衙也设在长安，但比较清闲，坐食俸禄而已，就像高句丽僧人吃饭前不念经祈祷一样。至于高句丽僧人赴斋前为什么不像汉僧那样“咒愿叹呗”，或许是佛教传入高句丽之后，高句丽僧人的吃斋前后诵经方式和唐朝有所不同，唐人并不了解其中情由，乱加品评，或许真如唐人的讥讽，入唐高句丽个别僧侣的行为，影响了唐人对高句丽整个僧侣阶层的总体评价。当然，唐人是否带有对高句丽遗民的偏见评论此事，这些都是应该认真探讨的问题。而右御史台官员被嘲谑成高句丽僧在整个唐朝相当普遍。《太平广记》卷 249 “卢廌”条亦引《御史台记》记载曰：“唐殿中内供奉卢廌持法细密，虽亲故贵势，无所回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廌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sup>④</sup>连卢廌这样“举止闲雅”的人，也会笑谈右御史台是“高丽僧”，可见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流行。

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的律宗大师鉴真弟子“高丽僧”如海，则属于典型的“行为不端”僧人。如海其人因不满师兄道航的负面评价，诬告师父鉴真和上等“造舟入海，与海贼连。都有若干人，已办干粮，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复有百海贼入城来”，结果惊动淮南采访使，致使鉴真第一次东渡日本行动夭折。淮南采访使经过查证，证明如海所讼并非事实，结果，如海“与反坐，还俗，决杖六十，还送本贯。”<sup>⑤</sup>笔者此前曾论证如海为入唐的高句丽遗民后裔<sup>①</sup>，并非所谓的新

①（清）曹寅等编《全唐诗》卷 26，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② 拜根兴《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2 期。

③（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254，“左右台御史”条，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④《太平广记》卷 249，“卢廌”条。

⑤（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罗人或者其他藩属国人。虽然道航等认为如海行为不端，不宜前往日本只是针对如海其人，但也显示出时人对一些高句丽遗民后裔的不同看法。《宋高僧传》卷 30 记载有高丽僧元表，卷 13 记载有高丽僧灵照，此两人应该是新罗僧侣，当与本文界定的入唐高句丽遗民僧侣没有关系。然而，高句丽僧真的是那种不“咒愿叹呗”，只是吃闲饭受布施的慵懒者，或者行为不端，受人诟病者吗？

《续高僧传》中也记载了三位高句丽籍僧人。该书卷 14《唐越州弘道寺释慧持传》记载，释慧持“乃听东安庄法师，又听高丽实法师三论，钩探幽极，门学所高”<sup>②</sup>。同书卷 15《唐越州静林寺释法敏传》云：释法敏“年二十三，又听高丽实公讲大乘经论，躬为南座，结轸三周。及实亡后，高丽印师上蜀讲论，法席彤散”<sup>③</sup>。《唐绵州隆寂寺释灵睿传》载：“开皇之始，高丽印公入蜀讲三论，[灵睿]又为印之弟子，常业大乘，后随入京，流听诸法。”<sup>④</sup>同书卷 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云：“有高丽沙门智晃，菩萨婆多部，名扇当涂，为法城堦。”<sup>⑤</sup>这里提到分别活动在越州的实法师、蜀地的印法师和长安的沙门智晃，他们都是当时名闻遐迩的藩邦高僧大德。僧实、僧印在三论宗方面，僧智晃在律宗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佛教宗派大体可以分为律、教、禅三类。律是律宗，其宗派巨子称为律师；教即教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等，教派中的佛学理论领袖称为法师。禅宗慧海在《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中指出：“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传寿命之遗风，洞持犯而达开遮，秉威仪而行轨范，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师者，踞狮子之座，泻悬河之辩，对稠人广众，启凿玄关，开般若妙门，等三轮空施。若非龙象蹴榻，安敢当斯？……”<sup>⑥</sup>可见，一名僧人能够被称作律师、法师，其佛学造诣是不可低估的。僧实、僧印已经具备中原高僧大德应有的学问和智慧，如此才受到当时佛教界的尊崇。而僧智晃精通律宗萨婆多部经典，则是律宗中不可多得的高僧。这三位僧人，均生活于隋唐之际，他们进入中原王朝求法巡礼，经过努力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在唐朝获得普遍的尊重和好评。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现在了解入唐后的高句丽僧人相对不多，虽然处于当时特殊环境之下，唐人对他们的认识应与他们的事迹密切相关。当然，应该剔除可能的夸大和侮辱成分。

#### 四、结语

唐人之所以会如此看待高句丽，有其深层原因。首先，在华夷观念仍然存在，唐朝津津乐道的宗藩模式下，周边民族无疑都是中原王朝的附庸。唐太宗就曾阐述对周边民族的看法，“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sup>⑦</sup>。虽则如此，各个时期对高句丽采取的具体策略及产生的效果还是有差别的，而唐人对高句丽的认识也不例外。其次，总章元年（668），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高句丽，流寓唐朝的高句丽遗民在入唐之初受到唐人的奚落及冷眼。但这种情况与唐朝开放包容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并不合拍，也不符合唐朝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如同对待其他入唐民族人士一样，唐朝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入唐高句丽遗民，高句丽遗民亦很快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逐渐融入唐人的共同体之中。有学者认为：“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对于异族人的行为，唐人歧视得较少；包括高丽人在内的异族人也少有人因族出而畏首畏尾”。<sup>⑧</sup>如上所

① 拜根兴《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4《唐越州弘道寺释慧持传》，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1991年版。

③《续高僧传》卷15《唐越州静林寺释法敏传》，同上。

④《续高僧传》卷15《唐绵州隆寂寺释灵睿传》，同上。

⑤《续高僧传》卷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同上。

⑥《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⑦《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

⑧ 姜清波《参与唐玄宗宫廷政变的高丽人事迹考》，《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述，具体情况可能还稍有不同，唐人的居高临下萌发于边疆一系列的凯旋胜利，有些情绪是自然而然情不自禁的流露，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刚刚进入唐朝中心区域的高句丽人，他们面对的现实及自身的感受可能是五味俱全，有心怀顾忌、如履薄冰，也有不顾后果、铤而走险，对此，上文已有所提及，在此不赘。应当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只是发生于高句丽入唐之后短暂的时间内。而对于入唐的原高句丽上层人士以及一般的兵士，只要心甘情愿和唐朝合作，为唐朝所用，他们本身蕴含的价值就会展现出来，唐朝廷对他们就表现出更多的优礼和信任。

1990年4月，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平等乡楼子沟村北0.5公里处出土了高句丽人高足酉的墓志，对此笔者曾有过一定的探讨，认为高足酉是少数志愿投诚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士之一，他的投诚发生在“高句丽内讧发生之后，唐廷派兵迎接泉男生等，并共同灭亡高句丽之前”<sup>①</sup>。武则天为扩大武周王朝的影响，于延载元年（694）在神都洛阳皇城端门外建造天枢，高足酉作为入唐外藩酋长参与这一工程。天枢建造完工后，高足酉被擢任“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sup>②</sup>。同时参与其中的高句丽遗民泉献诚充当“子来使”，成为监督这一举世闻名工程的使职官。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高句丽人高性文、高慈父子。高氏父子也是在高句丽发生内讧时投诚唐朝。墓志载曰“属祲起辽东，衅萌韩壤，妖星夕坠，毒雾晨蒸。公在乱不居，见几（机）而作”。高性文“预见高丽必亡”，“乃携率昆季，归款圣朝”。归唐之后，高性文与其子高慈在历次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父子双方战死疆场。武则天两次下制褒奖，“高性文父子忠鯁身亡，特令编入史册。”<sup>③</sup>和其他获得功勋的蕃汉军将臣僚相比，高氏父子受到武则天的褒奖与礼遇，没有丝毫的异样，显示出武周朝廷对蕃汉将领一视同仁的政策趋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唐高句丽遗民与唐人杂居通婚，在开放包容的整体环境下，与其他入唐民族的人们一样，最终形成统一的唐人共同体。

## On the opinion of Tang people on Koguryo and Koguryo adherents

Bai Genxing Hou Zhenb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was a suerian-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Koguryo. How did the Tang people look upon Koguryo who always make troubles? A lot of Koguryo adherents came into Tang Dynasty after their nation be conquered. In the inclusive and open country, what was the feeling of Tang people on these adherents? However, the academic circles seldom pay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Undoubtedly, the opinion of Tang people on Koguryo and its adherents experienced a changing process. Like other ethnic groups who came into Tang Dynasty, Koguryo adherents blended into the community of Tang Dynasty, and that showed the great inclusiveness and centripetal of Chinese nation in her forming process.

**Key words:** Tang people Koguryo Koguryo adherents

① 拜根兴《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墓志铭考释》，（韩）《中国史研究》总第12辑 2001年。

②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万岁通天 003，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③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

